

李 寔 著

现象与文本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 甯 著



现象与文本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象与文本/李骞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6

ISBN 7-222-03499-4

I. 现... II. 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云
南省—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051 号

责任编辑: 宋家宏 潘 灵

封面设计: 西 里

本书由云南民族学院科研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现象与文本

李骞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84 千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22-03499-4/I · 1019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回顾与前瞻：云南文学五十年论	(1)
女性抒怀：云南女作家创作论	(19)
边地叙述：论近年来云南大散文的文化品格	(37)
论云南文学的多元化选择	(49)
新时期云南诗歌概论	(58)
新时期云南散文发展概述	(71)
论云南“后生代”诗的美学追求	(79)
突围之后的突围：论九十年代的云南诗歌	(89)
拓荒者之歌：论云南八九十年代的彝族诗歌	(106)
批评的真性和真性的批评： 读《滇池》1997～1998“文学批判”札记	(123)
现实的报告和报告的现实： 对四部长篇报告文学的读解	(134)
“知人”然后“论世”： 对《李乔评传》的评论	(143)

论李乔小说的社会价值	(149)
李乔近作简论	(156)
论晓雪爱情诗的审美价值	(173)
论张长的小说	(186)
李必雨论	(203)
美的发现与表现：张昆华中篇小说漫评	(219)
情感的艺术：重读《荒火》札记	(226)
平淡的深刻：论于坚的诗	(233)
他种下一片生命和爱情之树： 评诗集《隐藏的土地》	(247)
文化的山和山的文化： 评大散文《云南的山》	(254)
后 记	(260)

回顾与前瞻：云南文学五十年论

云南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曾经有过辉煌的杰出历史，如果我们把云南五十年来的文学现象放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框架中去考查，应该说其边地性、民族性的特点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有其特殊地位的。当然，一个省的地方文学的发展，与作家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单个作家的创作汇集在一起，自然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当我对云南近五十年来的文学作品进行梳理和考证之后，我试图对云南 1950 年至 2000 年的文学作一点宏观的现象式的描述。

上篇：五十年代的辉煌

我的文章中所说的“五十年代”是一个比较宽阔的时间

概念，主要泛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云南当代文学。也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家们所说的“十七年文学”，而我的文章中所提出的“五十年代”，不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已，它同时涵盖了云南六十年代前半期的部分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云南虽然地处边地，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并不比内地落后。如果我们把五十年代的云南文学放在整个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中去辨析比较，便有理由相信，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质量，从作品的影响、作家阵容的组成，都远远超出内地其它省、市。有人认为五十年代的云南文学是北京之后的又一个中心，这种说法虽然缺乏理论依据，但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当年的云南文学确实有过其历史的辉煌。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性意义符号的具体化，其作品的内容总是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代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事实上，越是优秀的作品，越难超于时代与社会对它的规范和制约。自作家文学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发展时期，其时代与社会的广泛的政治意义不可能不对作家作品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解读云南五十年代的文学现象时，必须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与作品进行实际意义的对话，而不能用当下流行的或者是自己所持的文学观念去分析那个时代的作品。无论是阅读欣赏者还是阅读批评者，其观念世界与作品的观念内容本来就是疏远和隔阂的，我们就更不能因为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差异的扩大而加深这种疏远和隔阂，而应该通过对作品的阅读进行信息的交换和沟通，以实现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客观意义的评价。云南五十年代的文学相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当代

文学来说，的确有它的特别之处，这与云南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地域的复杂性、少数民族的多样性、社会型态的多层次性、自然气候的立体性、文化景观的丰厚性、经济发展的滞后性等。作为那个时代象征符号的文学作品，上述各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特殊性”现象理所当然地成为其表达和叙述的对象，所以，云南作家作品的审美形态从表达形式上就必然有着与众不同的韵味。这一个时段的云南作家阵容主要由三种类型的人员构成。第一部分是沿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作家，他们是李广田、马子华、李乔、陆万美、刘澍德等人。这个作家群体有的是外省籍的，如李广田、刘澍德，由于战争或其它的各种客观原因，他们在三、四十年代就来到云南，并在这块丰厚的边疆多民族的土地上继续文学创作。而马子华、李乔则是从云南走出去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后，再回到故土进行笔耕创作的作家。这个类型的作家对云南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的作品对云南五十年代、乃至于云南的当代文学来说，是一种追本溯源的先河之作。第二个群体是以冯牧为核心的军旅作家群，他们是苏策、白桦、彭荆风、公刘、寒风、林子、季康、公浦、周良沛、杨昭以及稍后的饶介巴桑、张昆华、李钧龙。军旅作家是一支外来队伍，他们把革命的激情与边疆少数民族风情结合起来，完成了主流意识对边地风物的解读，从艺术上拓宽了云南五十年代的文学道路。这个群体的作品既扩大了作为地域意义上的云南的影响，又为云南当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个群体是土生土长的云南籍作家和新中国成立后从外地来昆参加边地建设的作家，他们有的解放前参加革命解放后开始创作，有的从基层走向作

家队伍，有的是从校园里走出来的作家，如杨苏、晓雪、李鉴尧、柏鸿鹄、普飞、张长、杨明渊、冯永祺、刘绮、李石生、蓝芒等人。他们的作品比较重视对边地风景的描绘和对解放后的云南各民族人民新的道德行为的解剖，他们试图用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来规范古老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们的作品对五十年代的云南文学来说，和军旅作家群有着同样的效果。

由三个作家群体共同建构的云南五十年代文学，虽然每个作家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却是一致的——即“解放情结”。每一个作家都按照自己对刚刚诞生的新政权的理解，用文学作品的方式来解答新的政治话语对于这块地处边疆的厚土所发生的作用，解释新的政权是如何使一些原始部落的少数民族人民怎样获得作为人的新生的。五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面对这些具有历史文化遗迹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又如何评价呢？我们当然不能用现存的文学观念去图解那个时代的作品，我们只能历史地、客观地回到那个时代的文学叙事话语中，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学作品作出不带任何偏见的解读。已经被文学史证明的云南五十年代的优秀作品有很多，如李乔的《拉猛回来了》、《欢笑的金沙江》，刘澍德的《桥》、《新来的社员》，白桦的《山间林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彭荆风的《当芦笙吹响的时候》，林予的《猛铃河边春来早》，公浦的《绿色底层》，季康的《米涛和他的儿子们》，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统裙》；以及公刘、晓雪、周良沛、白桦、张长等人描写苍山洱海、怒江峡谷、阿佤山寨、版纳风情的优秀诗歌；李广田、李钧龙、张昆华、刘绮、冯永祺、

刘祖培、张勤等人的散文或短篇小说。五十年代的云南是一块待开发的文学处女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复杂的社会问题、多样化的少数民族群体，使一些山寨部落还处于一种原始的生存状态。而新中国的诞生，无疑要给这种原生态的社会结构进行新的解体和重组。苦难的历史、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以物易物的经济货币交换形式、古老的有悖于文明进步的原始习俗，都随着新政权的确立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于是，边地各民族人民的翻身喜悦之情便成为作家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几乎所有五十年代的云南作家都把云南各民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作为描述的主要内容，《欢笑的金沙江》叙写了处于奴隶社会的云南小凉山的彝族人民，在共产党派出的工作队的带领和帮助下，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在于运用小说的“三部曲”形式，对小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作了史诗般的纪录。文学作品作为观念形态的派生物，无疑要打上时代的、阶级的、民族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解读《欢笑的金沙江》，我认为这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的社会价值是极其丰厚的。李乔在小说中把人性的解放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联系起来，在作家看来，小凉山的奴隶社会完全颠倒了人性发展的最基本规律，其部落奴隶制的封闭性和稳定性，窒息了人的生命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因此必须彻底摧毁。边地的奇异性、民族风情的特殊性构成了云南五十年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绿色底层》等小说，是作家带着主流文化和中原文明的心态，对边地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风情的观察、体验而完成的，而且大都出自军旅作家之手。这

一类作品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中，以一种叙述对象的陌生化而独立文坛，作品的意义还不仅仅是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倾注了满腔热情，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文本意义暗示了新的政权给古老而落后的边疆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翻身解放同时也意味着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解放，随着新政权的诞生，落后的思想必然要被社会的进步所淘汰，《桥》、《没有织完的统裙》所表达的主题就是如此。《桥》是刘澍德建国后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也是五十年代初较早描写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两种思想冲突的优秀作品，老一代农民高正国和他的女儿二珠，分别代表了两种道德观念，作品的描写焦点主要集中在新的理想对旧的观念的颠覆，因此作品完成了从观念向符号的艺术转化。《没有织完的统裙》写的是景颇姑娘娜梦与她的母亲麻比在织统裙上的不同态度和矛盾，通过平凡生活中的三件事，展示了新一代景颇族青年的精神境界。

五十年代的云南文学是辉煌的，就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言，与当时的中国当代文学等量齐观，所创立的边地叙述话语，对之后二十年的云南文学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中篇：八十年代的复兴

我这里所说的“八十年代”文学，同时也包含七十年代末期，也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家们所说的“新时期”文学。

进入八十年代，云南文学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开始了

春天般的复兴。创作环境的宽容，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主流话语不再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作家获得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主权。八十年代的云南文坛也是由三个作家群体构成。首先是被政治冷落多年的老作家开始了自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春天，李乔、苏策、彭荆风、杨苏、公浦、欧小牧都有长、中、短篇小说问世；晓雪、张昆华、张长、周良沛、李钧龙等人的创作实力得以全方位的发挥，他们的作品显示了云南八十年代文学早期的雄厚力量，是五十年代的云南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再生和延伸。与当代中国文坛一样，一批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地下写作的作家光明正大地浮出水面，他们出手不凡，一旦进入状态，便佳作不断。他们是黄尧、汤世杰、胡廷武、李霁宇、米思及、张永权、李必雨、黎泉、董秀英、白山、何真、刘鸿渝、张承源、戈阿干、晏国珧、杨世光、吴然、原因、淡墨、黄晓萍、欧之德、杨伊达、毛诗奇、瞿文早、王维凡、王淑珍、吴慧泉、何群、袁佑学、马宝康、马明康、老楷、邹昆凌、江野、那家佐、那家伦、蒋仲文、夏天敏、邹长铭、阿里、邵春生以及已经离开云南的晓剑、严亭亭、邓贤等人。这批作家有的是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并开始文学创作，有的是属于知青作家的范畴。这个群体的作家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十年代的老作家而言虽然稍有开放，但从总体上说，仍然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沿袭。当然，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黄尧、汤世杰、胡廷武、李霁宇、张永权等人进入九十年代后，其叙述方式有所变化，但从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上判断，他们笔下的诸多力作如《世纪木鼓》、《灵息吹拂》、《云南的山》、《壁虎村》、《一个老兵的日记》等作品，其叙写空间仍旧是现实主义的扩

充。另一个创作群体或来自当时的大学校园、或来自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或来自军旅的文学青年，如于坚、张庆国、范稳、费嘉、沈石溪、王坤红、张倩、彭国梁、姚菲、刘扬、沈骏康、海男、先燕云、彭鸽子、徐刚、岳丁、晨宏、哥布、存文学、黄雁、冯德胜、王红彬、黄玲、潘灵、李森、雷平阳、黎小鸣、杨红昆、柴枫子、许泰权、高文翔、大副、胡性能、杨鸿雁、张永刚、张仲全、陈衍强、成忠义、基默热阔、纳张元、米切若张、李云华、李梦、夏吟、沙蠡、查拉独几、拉木·嘎吐萨、郑千山、潘上九、田应时、李晓松、贾薇、段平、艾扎、李阳喜、杨泽文、杨佳富、赵振王、李智红、缪开和、罗汉、曹先强、马丽芳、柏叶、李建明、李琳、王尚宁、密英文、杨三皮、野岛、张绍碧、王若杰、李骞等人，这个群体易于接受新的文学观，他们开始文学创作时正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观念大讨论的时代，当时中国文坛流行的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被他们不加消化地吸收，因此，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的创作实际上处于盲目的仿造阶段，而且他们之中一些在八十年代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和作家，进入九十年代后已经淡出云南文坛。不过到了九十年代后，他们之中的另一部分作家又成为云南文坛的新锐力量，如于坚、海男、张庆国、范稳、存文学、哥布、黄玲、先燕云、李森、雷平阳、潘灵、黎小鸣、胡性能、纳张元、张仲全、马丽芳等。从创作队伍的年龄上看，八十年代的云南文坛基本上形成了老、中、青三位一体的梯形结构。从小说创作的实力上看，八十年代的云南文坛相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其力量比较贫弱，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的好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的小说能够引起云南以外的批评界自觉自为的热

情关注（友情评论除外）。而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时期，可以说每隔两年就掀起一个小说浪潮，诸如“伤痕”文学、“反思”小说、“改革”文学、“知青”小说、“大自然”文学、“心理分析”小说、“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等等。十多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反观云南八十年代的小说时，便不无痛惜地发现，没有一个云南作家能够成为当时中国小说界的某一个潮流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人都成为新时期中国小说史的背景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云南文坛的缺憾。当然，八十年代的云南文坛也产生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小说，如李乔的《未完的梦》、《一个担架兵的经历》、《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奇遇》；苏策的《远山在落雪》；彭荆风《鹿衔草》、《黑红白》；张长的《空谷兰》；张昆华的《蓝色的象鼻湖》；黄尧的《荒火》、《女山》；汤世杰的《高原的太阳》；李必雨的《野玫瑰与黑郡主》；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等。但是把这些作品放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框架中去考察，就感到分量太轻，不足以和内地作家的作品抗衡。而一个地区文学的繁荣与否，小说常常是至关重要的标准。八十年代初期的云南诗歌在写法和题材的选择上与五十年代没有多少区别，作品依然是对云南边疆厚土的热情讴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云南诗坛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创作趋势，当时中国诗坛的各种流派的创作都能在云南找到其影子。和小说不同的是，以晓雪、饶介巴桑、周良沛、米思及、于坚、费嘉、海男、柴枫子为代表的云南八十年代诗人的作品，与当时的中国诗坛的距离并不遥远，而且于坚以他坚韧不息的探索精神成为“朦胧诗”之后中国诗坛的领先诗人。因此从诗歌的角度看云南文坛，我们有理由相信云南文

学非但不滞后，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领导了中国诗坛的发展走向，比如于坚带有口语叙述的原生态诗歌就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后现代诗人。就诗歌作品而言，晓雪的诗集《晓雪诗选》、《苍山洱海》，周良沛的《红豆集》、《铁窗集》，米思及的《隐藏的土地》，于坚的《诗六十首》，费嘉的《抒情诗百首》都是八十年代云南文坛乃至中国诗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与五十年代相比较，散文创作在八十年代也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仍旧是用诗一样的情调写边陲的美丽神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文集有张长的《紫色的山谷》、冯永祺的《竹楼情思》，张永权的《南国红豆》，这些作品都把云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作为审美艺术的对象和本体，都是边疆文化风情的山水写意。作家笔下的苍山洱海，傣家竹楼、瑞丽江畔、景颇山寨是文章外化的大背景，而大背景之下的叙述，则寄托了作家对云南自然景色的抒情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的云南文坛有几部专事描述云南某一地域风物习俗的散文集，这些作品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如胡廷武的《秀山的魅力》、张昆华的《洱海花》、杨世光的《神奇的玉龙山》、熊家斌、胡骞的《畹汀风情》。这几部散文集从历史与现实的深处着笔，借山水写历史，借风景写人生，表面是某一地域的真实写意，实则是人生百态的真情叙述。《秀山的魅力》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胡廷武以秀山这一特定地理区域为描写点，分别从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人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着笔，全方位地道出了秀山魅力之所在，是“秀山”百态人生的真实写照。

纵观云南八十年代的文学，如果从作家队伍上看，远远超出五十年代。如果从作品的数量上考证，是五十年代的数

百倍。但是，文学的繁荣不完全是以数量的多少来评估的，虽然量的递增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但这仅限于文学的早期起始时段。一个地方文学的成熟，靠的是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来支撑，而绝不是靠作家人数的多少和作品的数量来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时期，是中国文学全面复兴的时代，名家倍出，名作充栋。而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云南八十年代文学，能够提供出多少供中国当代批评界阐释的文本？有多少秀出群伦的作家是史学界不能忽略的？北京是中国文学的中心，这当然是地处边陲的云南不可比的；上海是中国经济的大都市，云南也无法与之抗争；江浙沿海、陕晋平原、齐鲁大地，云南文坛似乎也难项其背。那么相邻或相近似的四川、贵州、西藏又如何？就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在整个云南文坛的八十年代，还没有出现扎西达娃、何士光、周克芹那样的优秀作家。文学史是文化文明传播与繁衍的工具，她记载了各个时代作家的创作业绩和作品的文本意义，同时她又残暴地扼杀了那些作为背景的作家和作品。因此从文学史的意义理解云南八十年代文学，我相信云南批评界只可能保持一种尴尬的言说，舍此别无其它选择。

下篇：九十年代的超越

用“超越”二字形容九十年代的云南文学，我认为比较妥帖。含义有两层：其一是指作家的自我醒悟和自我超越；其二是指对八十年代云南文坛的超越。九十年代的中文

坛，是个体文化的自觉自由时代，写作霸权和写作话语的垄断被彻底击碎。八十年代中后期文艺界对个性的呼唤以及对个体文化的呐喊，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实。“左倾”文艺观念的固有坚守、独断式的政治型文学批评，都随着文学道德价值的解构而被离弃。“五四”时代所倡导的文学的个人主义、文学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学的平民思想、文学的民间立场、文化的自由主义得到了大部分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认同。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包容万象的文坛，各种流派、各种方法、形形色色的创作手段、创作目的都闪烁登陆。个人的、群体的、感性的、经验的、思想的、形式的写作，都成为一种文学的现实而存在。在这种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之下，云南九十年代的文学开始了她自身的超越。

九十年代的云南文坛是一个超越的时代。

首先是五十年代的开始写作的老作家们勤奋笔耕，并在叙事方式上对过去的创作方法有所突破。如李乔的系列回忆散文，苏策的中篇小说《寻找包璞丽》、彭荆风的长篇小说《孤城落日》、张昆华的散文集《多情的远山》、张长的长篇小说《太阳树》、晓雪的诗集《爱》。其次是八十年代的那批中坚作家的力作大量涌现，如黄尧的长篇纪实《世纪木鼓》；汤世杰的长篇小说《情死》、长卷散文《殉情之都》、《灵息吹拂》、文化大散文集《烟霞边地》；胡廷武的文化大散文《听鸟》、《云南的山》；李霁宇的长篇小说《壁虎村》；张永权的长篇叙事诗《一个老兵的日记》，这些作品无论是叙事的外部形态，还是其内蕴的深层结构，都超越了作家八十年代的作品，并引起了省外批评界的关注。《世纪木鼓》的意